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当代侦探小说研究》(10BZW087)阶段性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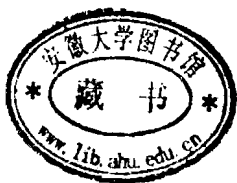
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

100 (1908—2011)

第三卷

雪 狮

任
翔
主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狮 / 任翔主编.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0

(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 1908-2011)

ISBN 978-7-303-15265-0

I. ①雪… II. ①任…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89487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0 mm × 240 mm

印张: 28.75

字数: 499 千字

版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策划编辑: 赵月华 责任编辑: 陈佳宵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耿中虎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采得百花成蜜后

(代序)

侦探小说源于西方的启蒙时代,自1841年美国作家爱伦·坡开创侦探小说的写作范式以来,经柯南·道尔、克里斯蒂、奎因、勒布朗、西默农、埃科等作家的不断拓展与创新,侦探小说已不再是一种仅供读者消遣的通俗读物,而是作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文类跻身文学经典之林,并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现代世界的广大读者。

—

中国侦探小说是典型的“舶来品”,它发生在特定的历史语境里,经历了译作、仿作到自创的演变过程。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和《新小说》是译介侦探小说的倡导者和理论实践的先行者。1896年,《时务报》刊发了由张坤德翻译的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这是中国最早引入的侦探小说。此后,西方侦探小说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其中影响最大、最受读者青睐的当属《福尔摩斯探案》。除《福尔摩斯探案》外,其他西方著名侦探小说家的作品也被译介到中国。在众多的译介侦探小说中,法国著名侦探小说家莫里斯·勒布朗创作的侠盗加侦探亚森·罗宾,在当时读者中的知名度仅次于福尔摩斯。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几乎将西方著名的侦探小说全部引介到中国。

随着侦探小说被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所接受,译介西方侦探小说出现了一片新天地。正如阿英所描述的,“由于侦探小说与中国公案小说和武侠小说,有许多脉搏互通的地方,先有一二种的试译,得到了读者,于是便风起云涌互应起来,造成了后期的侦探翻译世界。与吴趼人合作的周桂笙是这一类译作能手,而当时的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以上”。^①在侦探小说的翻译热潮中,有些译作几乎与西方原创的侦探小说同步上市。“抛开日本这

^① 阿英:《晚清小说史》,217页,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

个中转站,直接取法欧美,步伐甚至走得比日本还快,在这个特殊的艺术领域里基本上与世界文学潮流同步。”^①译介西方侦探小说的热潮直至辛亥革命爆发后才渐渐降温。

西方侦探小说为什么会在中国读者中产生如此狂热的阅读效应?从文学发展规律看,一种类型的文学模式能够存在,总是以其自身的审美趣味与读者达成某种默契,从而获得其独特的欣赏价值,只有这种文学模式和读者的期待视野、欣赏习惯和审美心理相吻合,读者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并保持持久的热情。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狂热的阅读效应,除了西方侦探小说呈现的新颖的故事、惊险的场景、曲折的情节、神秘的悬念、智慧的侦探等审美特性外,还在于西方侦探小说隐含着诸多的人文意趣。一是神学的意境。英国早期侦探小说批评家玛乔丽亚·尼柯尔森(Marjorie Nicolson)带着极嘉许的口吻肯定侦探小说的生命意义。读者对侦探小说的兴趣体现了一种“因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激变而出现的精神动荡,在没有秩序的环境里生活总是让他们苦恼。所以,对侦探小说的兴趣往往还体现了读者想返回到简单安宁而又秩序井然的宇宙的强烈渴望,他们想生活在一个有秩序的宇宙就像生活在家里一样”。^②读者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安全感却在侦探小说里找到了寄托。因为侦探小说隐含着一种异样的精神景观——罪恶终将被惩服,混乱的秩序终将得以恢复,侦探小说在遥深的意旨上接近了神学。二是哲学的意蕴。侦探小说的内容充满着理性与非理性、健康心态与变态精神之间的矛盾冲突,而这些问题持久地刺激着读者的兴奋点,甚至把理性带到了极限——认识世界和认识人类的根本问题,这样的困惑及其化解,使人类自身得到了精神上的抚慰。三是文化的意味。侦探小说作为一种大众文学读物,其深层也深刻地触及人类的终极眷注。从历史发展看,犯罪的发生几乎与人类历史同等悠久,犯罪现象遍及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公共领域到私人空间,每时每刻都有神秘的死亡发生,而人类又是那么无力地拒绝神秘的诱惑。侦探带着科学的探索精神和宗教般的情怀,去揭破死亡之谜和为制服犯罪而进行的努力。侦探小说不仅呈现了人性的秘密,而且也揭示了人类的命运。四是符号学的意义。“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侦

①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4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② *Whatever Happened to Sherlock Holmes: Detective Fiction, Popular Theology, and Society*, By Robert S. Paul,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7.

探小说作家,他们都特别善于从文化上改写占统治地位的辩证法。”^①因为侦探小说文类坚定地偏爱一种场景——犯罪场景与侦破场景——的书写。这个场景不仅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而且还是一个具有高度智慧的世界。侦探与罪犯在这个密闭的世界里,进行着人类的智力、毅力与信念的博弈。正是因为西方侦探小说蕴藏着如此深邃的人文意趣,它一踏入古老的中国大地,就以其独特的魅力征服了亟待启蒙的中国读者。

二

西方侦探小说的译介为中国侦探小说的诞生吹响了号角,但必须明确中国侦探小说是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现实社会的土壤里,浸润在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里。毋庸置疑,中国侦探小说与传统公案小说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虽说侦探小说宣扬的是法治而非人治,要求的是科学实证而非主观臆断,讲究的是人权而非皇权,但是两者却有着诸多共同的喜好和交替互渗的表现。首先,侦探小说与公案小说不仅“形似”而且“神似”。虽说公案小说源于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沉淀,而侦探小说则诞生于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历史也仅区区的百余年。但两者既有着“形似”又有着难以割舍的“神似”。“形似”——两者都在运用人类的智慧,昭示案件的真相。“神似”——探案者都坚持不懈地追求正义,惩恶扬善是他们共同的主题。如果说西方侦探小说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影响是显性的,它为中国侦探小说的诞生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模式,那么传统公案小说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影响则是隐性的,它是中国侦探小说诞生的精神传承。其次,侦探小说与公案小说同属“乐感文化”,有相似的审美趣味。传统公案小说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广泛的读者基础,并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审美接受心理,普通读者阅读公案小说,更多的是偏重于其娱乐功能,希望作品中最终都能出现一个“报应分明,昭彰不爽”的圆满结局,在阅读过程中享受拍案称快之乐,而无凝思长叹之忧,这种传统的“乐感文化”不仅制约着普通读者的审美选择,而且还积淀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层意识之中。以启智娱乐为开端的西方侦探小说也可归属于“乐感文化”——扣人心弦的悬念设置、严密细致的逻辑推理和案犯必遭惩罚的完美结果,它能够带给中国读者紧张而不疲惫、轻松而不乏趣味的审美享受。再次,侦探小说汲取了公案小说的精髓,完

^① *The Art of Detective Fiction*, Edited by Warren Chernaik and Robert Vilai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2000, p. 12.

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从侦探小说文类生成看,反映了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认同的复杂过程。侦探小说的译者在翻译西方侦探小说之初,其目的是希望借助侦探小说以引进新思想来变革中国的社会现实。但事实上,这些深受传统礼教影响的文人在观念上仍然保守。他们在译介和创作侦探小说时都会渗入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从早期的侦探小说译本看,很多译者都使用章回体的形式和文白相杂的语言,作品中既反映出译者浓厚的传统法文化思想,又传递出译者对西方现代法治文明的渴望。而在最初的中国原创侦探小说里,不难发现,作者可允许侦探在侦破案件时有失误,但不容许侦探在道德上有瑕疵,这正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徘徊于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思想写照。他们既羡慕侦探的理性精神,又摆脱不了传统的青天意识,因此,他们希望塑造一个可与西方侦探相媲美却带有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新侦探形象,这是当时中国侦探小说作家的一个理想目标。

虽说侦探小说承传了公案小说的血脉,从内容到形式完成了一次完美的现代转型。但是,不可否定的是,诞生在中西两种不同文化语境里的侦探小说和公案小说,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侦探小说体现的是现代的理性思辨精神,讲究的是科学与民主,弘扬的是法治思想和社会正义。作品中的私家侦探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他是现存法律制度的叛逆者,试图在当下法律规范下建立公平与正义,以实现个体的价值与理想,本质上从属于“民间立场”。而公案小说呈现的是政治的伦理和道义上的因果关系,体现了一种在王权统治之下的群体思想,不论是包公、于公还是狄公,他们对于现存意识形态都带有先天的维护意识,本质上从属于“官方立场”。

三

西方侦探小说大规模的引入,为中国侦探小说的发生打造了绝佳的模板,而传统公案小说的伦理价值则为中国侦探小说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在两种各具特色的文类催化下,作家们的创作意识被激活,他们开始借鉴西方侦探小说的叙事技巧进行创作。当然,借鉴并非只是机械的模仿,这里面隐藏着侦探小说作家在遭遇中西两种文学观念时的艰难抉择。不可否认,最初的侦探小说作者基本上都是“旧式文人”,他们大多以写言情小说起家,在创作过程中,一方面极力模仿西方侦探小说的艺术技巧,另一方面又很难摆脱传统小说观念的影响。在经历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交往”与“对话”中,中国侦探小说作家开始逐渐领会并有选择地“拷贝”西方侦探小说,最终形成有中国

风味的侦探小说。

根据现有的文献,中国最早的侦探小说是1901年由剑铎创作的《梦里侦探》^①,至1904年以后,中国侦探小说的创作才有所发展。1905年,《江苏白话报》第一期刊载了由挽澜创作的《身外身》和《美人脂》。同年,《广益丛报》第六十五号刊载了冷血(陈景韩)的《歇洛克来游上海第一案》。1906年,广智书局出版了吴趼人的《中国侦探案》。1907年,《月月小说》第七号刊载了周桂笙的《上海侦探案》。1908年,《月月小说》第二十一号刊载了黄翠凝的《猴刺客》,该作品是目前能见到的早期比较成熟的中国原创侦探小说。这是张坤德首次译介福尔摩斯探案十余年后,出现的现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这一方面是因为侦探小说文体太先锋,叙述内容太丰富,逻辑要求太严谨,而使众多意欲创作侦探小说的作家望而却步。侦探小说的写作不但要求作者具备文学的素养,还应兼备文学之外的诸多知识,比如逻辑学、心理学、犯罪学、化学、医学等。另一方面,在于作家的价值趋向。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往往受制于自身的文化背景。中西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趋向,中国文化属伦理型文化,注重以社会为主动、个人为受动的关系连接起来的社会秩序,西方文化属科学型文化,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引出的社会结构。侦探小说作家对法律的诉求、对科学的期盼、对正义的瞩望都带有特定的文化印痕,而晚清作家尚未完全挣脱伦理型文化的“羁绊”,他们在“东张西望”中渐渐成熟。

吴趼人和周桂笙是当时著名的小说家与翻译家,但无论是吴趼人的《中国侦探案》,还是周桂笙的《上海侦探案》,从文体到内容仍属公案小说的范型。尤其是吴趼人,他试图革新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以适应新的时代和新的读者,《中国侦探案》就是他革新的结果。周桂笙的《上海侦探案》尽管也是“公案体”,但其在叙述内容上明显汲取了“西洋文明”。从吴趼人和周桂笙的创作中,可以发现这么一条规律,中国最初的侦探小说创作经历了由“公案体”到“侦探公案体”的演变过程,这也印证了中国侦探小说的生成深深地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而非纯粹“西风东渐”的结果。

随着“侦探公案体”作品的增多,中国侦探小说作家开始在模仿中反思,在

^① 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编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所示,剑铎创作的《梦里侦探》发表在1901年的《启蒙通俗报》上。《启蒙通俗报》于1901年由傅樵村在成都创刊,1906年改为《通俗日报》。笔者查阅了国内多家图书馆与档案馆,均未发现1901年的《启蒙通俗报》,现存文献只查到1903年后的《启蒙通俗报》及更名后的《通俗日报》,未见剑铎创作的《梦里侦探》。因此,对《梦里侦探》是否有此作存有疑虑。

反思中创新,在创新中成长,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时代特色的侦探小说。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文坛上出现了第一个侦探小说作家群,主要作家有程小青、孙了红、陆澹庵、俞天愤、张碧梧、赵苕狂、何朴斋、徐卓呆、胡寄尘、张无铨(张天翼)等,产生了一批像霍桑、鲁平、蝶飞、李飞、宋悟奇、胡闲等“中国式”的侦探,这些“新新侦探”在读者中享有盛誉,其中被称为“中国福尔摩斯”的大侦探“霍桑”更是声名远扬,成为上海市民心中的英雄偶像。创作的繁荣与读者的接受,使得中国侦探小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早期的原创侦探小说中,读者反映强烈的主要作品有: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孙了红的《侠盗鲁平探案》、俞天愤的《蝶飞探案》、陆澹庵的《李飞探案》、张碧梧的《家庭侦探宋悟奇新探案》、赵苕狂的《胡闲探案》、张无铨(张天翼)的《徐常云探案》、王天恨的《康卜森探案》、何朴斋和俞慕古的《东方鲁平奇案》等。

至此,已完全摆脱传统公案小说束缚的中国侦探小说呈现出与西方侦探小说一致的审美特性——神秘、惊恐与悬疑。侦探小说鲜明的审美特性是神秘性,案情扑朔迷离,案犯踪迹不明,结局指向莫测。作者与读者似乎在不断地进行着设谜和解谜的游戏,从而也就在不断地进行着建构、颠覆、重构、再颠覆的解密过程,使读者在“奇诡突兀”、“别心怵目”^①的高峰体验中揭开谜底。侦探小说最具刺激性的是强烈的惊恐性。侦探小说总会牵涉谋杀、抢劫、爆炸等暴力场景的书写,而暴力行为的描写往往能够使处在相对安全环境里的读者的“暴力”本能得以导泄。人类的心理中都有一种“暴力”的本能,阅读侦探小说能使读者产生“惊骇错愕、目眩心悸”^②的心理体验。侦探小说最具吸引力的是悬疑性,悬疑也即作家在作品中营造的紧张而神奇的悬念,悬念成为侦探小说作家营建情节的枢纽,启迪读者心灵的钥匙,悬念也成为读者对人物命运和情节推进的预测和充满激情的期待。

四

中国侦探小说是中西文化融构的宁馨儿。它的诞生与中国社会的变动、文化的变迁、文学观念的变化紧密相连。考察中国侦探小说发展的全过程,可将其视为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想以及文学的一个缩影。侦探小说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中国近现代作家的创作观念,丰富了中国现代文体的类

① 周桂笙:《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载《新民丛报》,第3卷第7号,1904。

② 同上。

型,加快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而且使古老的犯罪题材文学获得了现代性——从对犯罪的政治伦理关注转向对公共秩序和个体生命的关注,从而促进了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形成、科学精神的传播以及法文化的建设等。

当今的中国文坛甚是热闹,各种主义、现象、流派层出不穷,然而,却绝少有文学研究者与批评者光顾侦探小说。在已有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里几乎难觅侦探小说的踪迹,即便在中国“通俗文学”史里,对侦探小说的阐述亦是浮光掠影,这一切严重地影响了中国侦探小说的健康成长。更可叹的是,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态,为读者提供独特的审美与情感体验的侦探小说亦被“公安小说”、“法制小说”、“犯罪小说”以及“侦破小说”等称谓取代,私家侦探的独特个性与超凡的智力也被人民警察的群体形象与集体智慧所替换。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迄今为止,能风行全球长盛不衰的文类之一便是侦探小说。融情、智、理、趣为一体的侦探小说有其独特的范式,故事中的侦探通过追踪蛛丝马迹而重构犯罪现场,以牢牢控制犯罪,以此抚慰被惊扰了的心灵秩序,恢复被损毁了的社会秩序。侦探是和平年代里读者心目中的英雄,这一形象是别的文类所不具有的。

笔者挚爱侦探小说,愿为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尽力。因此,笔者历时两载查阅了1896—2011年间的近千份报纸杂志,搜集并阅读了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近千部侦探小说作品,并对清末民初的侦探作品重新录入、断句并进行以繁化简的文字处理。“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1908—2011)”共十卷,110篇作品,400余万字,因篇幅所限,长篇小说未在其列。为体现“史”的脉络,所选作品均按发表或出版的时间排序。其中1908—1949年三卷:第一卷为中国现代著名侦探小说作家程小青作品;第二卷为中国现代著名侦探小说作家孙了红作品;第三卷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刘半农、张天翼、俞天愤、陆澹庵等人作品。因馆藏的清末民初期刊弥足珍贵,难轻易示人,一些选文想必是第一次与当代读者会面。读者可从中阅览中国侦探小说从滥觞期到兴盛期的整体创作风貌。1950—1976年一卷:收录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白桦、公刘、陆石、文达等人作品,这些作品以苏联的“反特防奸”为蓝本,融入“剿匪”、“肃反”的题材,作品明显地烙上时代的印痕,读者可真切地感受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波澜壮阔的斗争画面。1977—1999年二卷:中篇卷收录中国当代著名侦探小说作家蓝玛、李迪、钟源等人作品;短篇卷收入中国著名作家叶永烈、余华、叶兆言等人作品,读者阅读这些作品,可体验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出现的新变化,犯罪问题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错综复杂的社会世相。2000—2011年二

卷：中篇卷收录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莫怀戚和新锐侦探小说作家鬼马星、冯华、既晴的作品；短篇卷收录中国著名侦探小说作家蓝玛、郑炳南、孙丽萌及新锐侦探小说作家水天一色、周浩晖、林斯谚等人的作品。读者可领略到新世纪中国侦探小说无论是叙事内容还是叙事方式均添加了新元素，网络、毒品、腐败等题材已成为侦探小说的热点。除以上八卷外，还为小读者编选了两卷创作于1980—2011年间的优秀儿童侦探小说作品。深受小读者喜爱的儿童侦探小说作家谢鑫、杨老黑、许方等人的作品均在选集里，这些作品以小读者的视角叙写了神秘、悬疑与恐怖的侦破故事，不仅让小读者从中感受到侦探身上超凡的智慧，而且可从中体验到侦探身上传递出的刚毅与正气的精神品性。

“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1908—2011)”丛书的出版，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而系统的中国侦探小说读本，为研究者提供一幅清晰的中国侦探小说作品图谱，为当下中国侦探小说作家的创作提供可参照的范本，为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中国侦探小说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希望“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1908—2011)”丛书的出版能拓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为当下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生长点。

任翔

2012年8月18日于北京养木轩

目 录

猴刺客	黄翠凝/1
匕 首	刘半农/11
万丈魔	袁寒云/26
人耶鬼耶	张无诤（张天翼）/48
雪 狮	何朴斋/60
雪里红	何朴斋/67
夜半钟声	陆澹庵/79
X	张无诤（张天翼）/98
园 尸	王天恨/111
犯罪本能	徐卓呆/123
贿选案	徐卓呆/135
鸚鵡口中	赵茗狂/146
卍形碧玉	吴克洲/155
真 凶	朱 戟/163
白巾祸	俞天愤/173
三 A 党	陆澹庵/196
失宝记	张碧梧/225
南方雁	柳村任/238

窗外人影	柳村任/266
少女的恶魔	赵茗狂/318
符与咒	位育/358
疯人之秘密	郑狄克/420
后记	446

猴刺客

黄翠凝

马伟生，自专门化学毕业后，遂于家内另设一化验室，为每日研究物理之所，一年以来，无或间断。伟生年二十，性最勤，每日定以自修之时，少与朋侪来往，惟日专心化学，不事他途。而品貌极雅度，戚党多敬爱。家有老母及一幼弟，伟生极能尽孝友之道，曾与冯宝琴订婚。冯宝琴为音乐专门女毕业生，年仅十八，而妖冶绝伦，父没母存，无昆仲姊妹行，家拥巨资。人或利其多财，欲与彼论婚者，指不胜屈，惟宝琴独具慧眼，概拒之。后与伟生结识，喜其才品，遂与订婚焉。宝琴与伟生订婚及一载，而伟生每于课程暇时，必往宝琴家小坐。近以弟病，亦少过从。

一日，忽接宝琴来书，内谓有人言“彼将行与己离异，且另有意中人”云云。伟生因得是信，心郁结不安，随即乘马车至宝琴家。

宝琴正在音乐室抚琴，忽闻门外弹指声，舍琴而应，曰：“何人？请进！”

伟生即推扉入，见宝琴斜倚琴台，娇弱无力，急趋前握手，复以吻亲之，曰：“卿乎！宝琴乎！别未经旬，何以竟生疑虑？”

宝琴于伟生未入室时，知叩门者必伟生矣，乃预筹见面时竭己之愤气，向之发作。及伟生握手而问，则又转怒为悲，秋水双泓，梗麋而下，全身颤抖，几不自持。幸伟生紧握其腕以扶掖之，否则必踣地矣。

伟生见宝琴如此情形，心益怜之，徐扶坐软椅中，替拭泪痕，问曰：“卿究有何闻，致尔伤心？飞短流长之言，幸勿妄信。今日寄我之函，已遍阅过，惟其中原委，犹未知之。卿乎，尔既爱我，未知能为我一述崖末否

耳?”语次，复替宝琴揩涕。

宝琴回面背伟生答曰：“君尚以诡辞欺妾耶？妾虽不肖，然未曾开罪于君。夫儿女爱情，当不能为外物所动。今君近识一女友，而竟忘情于我，且向彼女求婚。吾试问君欲置妾于何地耶？妾初以君才品俱优，故委身以事。不料尔辈男子，多是负心物，得陇望蜀，却故恋新！”宝琴言至此，哽咽不能说，涕垂睫而纨澜。

伟生骤闻此刺心剝肺之言，忽欲不能作答，只唉声叹气曰：“天乎冤哉！吾不知卿从何处而得此谬说也！”

宝琴曰：“人替我不平，特来告我耳。尔犹欲增辞饰非乎？”

伟生顿足曰：“谁告卿知？卿必告我。”

宝琴曰：“君不必追究告我之人，事之真伪，尔自知之。”

伟生曰：“我自信无此事。”

宝琴曰：“前星期，尔曾与一女子跳舞，尚忆之乎？”

伟生曰：“固忆之也。”

宝琴曰：“如是，则人非诬君矣。”

伟生急曰：“卿以为吾与彼女跳舞，则必向彼求婚乎？”

宝琴曰：“此事尔何不一问自己？”

伟生曰：“吾与彼女素昧平生，岂一晤面即萌此意耶？前星期日，林国材突然携彼至吾家，谓‘彼女为梁伯爵之女公子，家甚富厚，特来此处选择良偶’云云。吾闻其说，亦未尝一注意。及晚，国材强挟吾同往俱乐部。至，彼女又强捉吾臂与之跳舞，吾力拒之不克。”

宝琴曰：“此言诚不伪耶？”

伟生曰：“真实语也，吾尚有一言告卿，若卿闻之，必将先前之疑团尽释。卿以为梁伯爵之女公子，为闺阁中之名媛耶？殆不然也。吾闻友言，彼曾在某处剧场演剧，彼名婀娜，今来此地正欲选择佳婿，故易名小凤。由此观之，则女公子者为女优伶耳。彼贱我贵，非吾偶也，又焉能以此有用之身，而与此无意识者结缡耶？”

宝琴听至此，不禁讶然叫曰：“嘻，是乎！吾知之矣，君因知彼为女优伶，故罢此议耳！”

伟生不觉失笑曰：“卿真多疑！脱彼真为伯爵之女公子，及其才与貌均比卿胜，而吾与卿之爱情，亦不能移甲赠乙也。且我辈生此廿一世纪文明支那国之时代，卿犹以我为二十世纪之支那国民哉？”

宝琴曰：“在今日文明世界，亦未尝无夫妇离异之说。”

伟生曰：“虽然。但近世之离异者，必因其人有大恶不德之事，乃行此等决绝，仍要经主婚官公判及戚族等证人公认其夫妇退婚，而后可。”

宝琴曰：“然则吾支那二十世纪时，犹未有此法律耶？”

伟生曰：“然。”

宝琴曰：“既无此法律，必无主婚官矣。”

伟生曰：“然。”

宝琴曰：“无主婚官，男女结婚以何人为主婚乎？”

伟生曰：“男女两家，各择一家长为之而已。”

宝琴曰：“彼男女均彼此相好而后撮合耶？”

伟生曰：“否，否，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

宝琴曰：“设如为儿女者，不喜娶此人及嫁此人，父母允代为另择一最适意者否？”

伟生大笑曰：“若如此，则不得谓之‘野蛮专制结婚’矣！”

宝琴诧异问曰：“然则为父母替儿女择婚，竟不商之儿女耶？”

伟生曰：“然。”又曰：“为男子者，父母或有周之一二，然亦不能妄为干预。不过令其知己与某人订婚，至于妻子之面，全未睹其短长肥瘠也。若女子者，直昧己身之究归何属，于归之日，始自知之。”

宝琴曰：“吾料二十世纪之夫妇，共凄凉、痛苦、怨恨、遗憾之处，尽人皆是矣！吁！为他人父，为他人母者，亦酷毒矣哉！”

伟生曰：“吾辈追论前人之事，尚替其伤心悯恻，而亲历其境者，更苦不可言。故二十世纪男女案多夫妻不睦者，即此致之。”

宝琴曰：“吾等幸不生于彼黑暗时代。妾尝读历史，见有论及此种野蛮之政体，殊令人拍案，愤毒不置！”

盖宝琴自与伟生谈论前世纪支那之旧政，津津有味，竟忘怀先前之怒。伟生见其稍释疑虑，乃行近宝琴前问曰：“卿尚疑我否？”

宝琴俯首微笑，徐徐答曰：“妾过矣，妾过矣！请君从此勿再提此事！”

伟生即以手抚宝琴之泽发，复曰：“此事究谁告卿乎？”

宝琴沉吟良久，侧首仰视伟生曰：“是林国材告妾。”

伟生佛然曰：“此人耶？固前妒卿与余订婚者，彼亦常向余道卿短处，余志坚未为所动摇。施之不行，今又转面，向卿诬我！”

宝琴急牵伟生手曰：“彼道妾之短耶，君信彼否？”

伟生曰：“吾极恶彼谈卿，其谁信之？”

宝琴笑曰：“然则彼之诡谋，徒费心血矣！”已而又曰：“君弟之病，现尚如何？”

伟生曰：“幸占勿药，惟犹未进膳。”

宝琴曰：“如是，良慰我心。”

伟生曰：“明日太和俱乐部开演大会，闻有著名音乐师，亦到赴会。我正欲乘兴一游，与卿偕行可乎？”

宝琴曰：“正佳，明日何时乎？”

伟生曰：“下午七点钟开会，六点半钟来此同行。”

宝琴喜曰：“妾久困家内，懊恼不安，明日往外一行，亦大妙事！望君明天早到此处！”

伟生诺之，兴辞而出。

翌日午膳后，伟生仍进化验室自修。至晚膳，更换华服，乘车直诣宝琴家去。时宝琴正新装初整，炫丽销魂，脂粉鲜香，罗纨妍媚。

伟生一见面，即叹曰：“卿真天人！吾有何幸福，竟能消受此美人乎？”

宝琴低首晕红潮颊问曰：“今可去否？”

伟生探怀其时计视曰：“七点矣。”

宝琴遂起，与伟生同驾油轿马车，一鞭斜指，直抵俱乐部去。

入门首，二人携手入，见来客纷纷，络绎不绝，座为之塞。伟生与宝琴行至稍静处，择一位坐下。旁观者目皆炯炯注视宝琴，且窃窃议其美艳。

时国材与小凤已至会，遥见宝琴及伟生在，即携小凤前行，又代向宝琴介绍。宝琴知小凤是冒称伯爵女，心颇鄙之，只随意与之点首。国材见其似有不悦之容色，以为宝琴存有妒意，心窃欣忭，乃问宝琴曰：“姑娘近日好否？”

宝琴曰：“承君盛意，妾迹来亦幸无恙。”

国材又谓伟生曰：“子今日竟暇至此耶？”

伟生曰：“然。”

小凤随执伟生手，笑问曰：“君数日来，忘却我耶？”

伟生见小凤作此下流举动，且在宝琴前说此不类之语，乃勃然愤怒，欲直斥之，旋以鲁莽，遂即淡漠答曰：“吾不知姑娘语意。”

小凤笑曰：“今对他人面前故作此憨态耶？”

伟生不禁怒曰：“仆与姑娘实一面之交，别无他事交涉，姑娘祈自重